

泗州杨士琦政治计谋述评

李忠萍

(安徽中医学院 社科部, 安徽 合肥 230038)

摘要:清末民初,素有袁世凯“智囊”之称的杨士琦献计献策,参与擘画并实施了“运动亲贵、掌握政权”、“附会伪造、倾陷政敌”“先发制人、杀人灭口”“巧饰掩蔽、推波助澜”诸计谋,为袁氏清末权倾朝野乃至民初独霸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却暴露了自己曲意奉承、阴险狡诈、助纣为虐的奴仆本性。因其如此,杨氏才尽遭后人的唾弃。

关键词:杨士琦;袁世凯;智囊;计谋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08)02-0032-03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人,举人出身。曾先后为李瀚章、李鸿章幕僚,袁世凯督直后,几乎接收了李鸿章幕府的全班人马,杨士琦顺理成章便成了袁世凯的幕僚。自此之后,无论在幕中还是出任官职,杨士琦都一意秉承袁氏的旨意,深受袁氏的信任,成为袁氏的左右臂。杨士琦头脑机敏,攻于心计,能思常人之不思,被黄远生称为是“有哲学思想的官僚”^{[1]21},袁世凯“事罔洪纤,尽以谘商”^{[2]104},故有袁氏“智囊”之称。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说“机密事,袁世凯与士琦共之,号袁氏智囊。世人误称赵智庵秉钧为智囊,因赵字智庵,有智无囊;智而贮囊,则杨杏城耳。”^{[3]209}身为“智囊”,杨士琦对袁世凯一直“恪尽职守”,为袁氏在清末政坛上叱咤风云乃至民初“登上龙座”费尽了赞襄擘画的心机,真乃一个不折不扣的善于献馘迎奉并且死心塌地的奴仆。

1 “运动亲贵、掌握政权”^{[1]21}

众所周知,从督直到被开缺回原籍的六七年里袁世凯权倾朝野,袁氏掌握权柄跟慈禧的宠爱有关,但主要是由于一个政治集团——庆、袁党的崛起。这个集团的领导者是庆、袁,成员包括朝廷多部尚书、侍郎以及外省督抚大员,如那桐、徐世昌、张百熙、荫昌、端方、周馥、陈启泰、孙宝琦、吴大澂等,袁世凯还与其中多人结成了亲家。表面看来,此党是由庆王奕劻控制,实际却是袁世凯一手指挥,因为庆王虽手握重权却贪鄙庸碌,徒有官场世故圆滑之腔调,并无驾驭措置的智慧和才干,故此党实为袁党。依恃庆、袁集团,袁世凯分布党羽、打击政敌,大有将中央和外省全部纳入麾下之势,名噪一时。袁世凯所以能和

诸多权贵特别是庆王沆瀣一气、呼风唤雨,全赖杨士琦提倡并实践的“运动亲贵、掌握政权”之策。

庚子年杨士琦曾随李鸿章北上议和,时因李鸿章年逾古稀、身体孱弱,杨士琦遂受命在正副全权议和和大臣(庆、李)之间联络肆应,从而得与庆王结识并熟稔。1903年,荣禄将死,慈禧有意让庆王入阁接任领班军机大臣,杨士琦及时向袁世凯献了“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锦囊妙计,袁世凯吩咐深知庆王喜好又机警善应的杨士琦“亲自操刀”,于是一场精彩的贿赂戏便拉开了帷幕。杨士琦将一张10万两银票送到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让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巧妙地回答:“袁官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4]128}杨士琦的一番巧言令色给了庆王就此收下的理由。不久,荣禄死,奕劻入主军机。杨士琦“以后还得特别报效”的允诺当然一一兑现,这场贿赂戏也就越唱越华丽了,以至“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庆王的孙子满月周岁,所需开支,都由袁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那就完全仿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而又过之。”^{[4]128}

自此,杨士琦穿梭于庆、袁之间,成了联系庆袁的纽带。袁世凯利用金钱对庆王的魔力,使庆王成了他的铁杆内援,“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世凯,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4]128},袁氏“遂遥控朝政,为有清一代最有权力之总督了”^{[2]208},杨士琦“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计谋得以完美谢场。

收稿日期:2007-09-10

作者简介:李忠萍(1977—),女,安徽天长人,讲师。

具有讽刺意味地是，杨士琦并不看好亲贵，他曾私下批评亲贵，“谓满洲亲贵离不了一童字，因私号某贝勒为童昏，某亲王为童顽，某某为童某”^{[1]21}，真可谓“俚词造意，适如其人”^{[1]21}。这或许是他有“哲学思想”的一面，但作为智囊，他必须看重亲贵手中的权力，必须为他的主子“经纬天下”，如此就不难理解他的谋略与“真性情”之间的矛盾了。但这种一面为主子向亲贵大献媚俗一面又对亲贵讽刺诋毁的功利嘴脸，终究无法让后人不对其大加誉议。

2 附会伪造、倾陷政敌

清末，满汉、新旧、清浊各派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其中庆、袁与瞿（鸿祺）、岑（春煊）二派的政争一度成为焦点。在这次政争中，杨士琦再次“大显身手”，结果导致瞿、岑被开缺回籍，庆、袁大获全胜。

瞿鸿祺、岑春煊也曾是西太后身边的红人，前者由老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引荐，经慈禧考核，庚子乱后从河南学政任上调入军机处，思想虽相对保守，但总算眼光卓远、老成持重、清廉耿介；后者骁勇善战，一直以慈禧的“看家恶犬”^[5]自居，因庚子年护驾有功，深受慈禧的宠爱，先后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四川总督（未到任即北上进京晋见太后，改任邮传部尚书）。他们对庆王父子的贪婪和袁世凯的恃权颇为不满，一明一暗（岑明瞿暗）同庆、袁进行较量。袁世凯曾试图拉拢他们，但他们不为所动，袁氏大伤自尊。1906年瞿鸿祺在官制改革特别是责任内阁制上的事实反对态度（直接导致慈禧对责任内阁制的否定和庆、袁计划的破产），以及1907年5月发生的“丁未大参案”即杨翠喜案件（袁、庆怀疑此案乃瞿、岑所主使），使袁世凯和庆王父子对瞿、岑更加忿忿不平，决定给予致命还击。

杨士琦、袁世凯深知慈禧最痛恨康、梁，因此杨、袁“心心相映”，密谋将瞿、岑与康、梁相附会。首先，杨士琦利用庆王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岑保举康、梁的几道奏折，“这两种文件（注：指戊戌年瞿、岑保举康、梁的奏折），足以为倾陷瞿、岑二人之证据。”^{[4]151}其次，杨士琦抓住了一个倾陷瞿鸿祺的“千载难逢”的契机（即瞿鸿祺将慈禧与他之间有关准备罢斥庆王的私人谈话，透露给了汪康年，汪又告诉了报界同人，舆论哗然，慈禧甚为恼怒，暗骂“瞿鸿祺混帐”^[6]这一事件），向袁世凯阐明要害，随即奉袁氏之命拟定了一份包含“确实证据”的奏劾瞿鸿祺的奏折，并花白银二万两买通瞿的同乡、侍读学士恽毓鼎具名，让他以自己的名义弹劾瞿鸿祺暗通报馆、阴结外援、授意言官、分布党羽等罪状；最后，利用岑春煊再次外放两广滞留上海的时间，

杨士琦通过在上海任职的蔡乃煌，弄到了一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影”（实际是蔡找到了康、岑的单人照片，然后交由相馆加工而成），遂由庆王密呈慈禧，奏劾岑春煊是康、梁的死党，滞留上海就是为了暗结康梁云云。这种附会伪造，慈禧无法识破，遂于1907年6月17日将瞿开缺，8月12日将岑开缺。

由此可见，此次打倒瞿、岑，“技高一筹”的杨士琦“功勋卓越”，有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杨士琦真是阴谋大家，他玩弄庆王父子，竟如傀儡后台的牵线者一般无二。但是傀儡的牵线者，仅仅是牵线而已，并不是编戏的人。士琦则身兼两个职务，而绰乎有余。同时，他又是世凯的智囊，他能仰体世凯的意旨，并能实行世凯的计划。这一次的大轴戏能够成功，大部分由于士琦的努力，我应该替他‘表彰’功绩。”^{[4]150}“打倒瞿鸿祺、岑春煊之后，论功行赏，应公推杨士琦为第一名‘功臣’。”^{[4]151}但这位“功臣”看似高明的计谋却让人如鲠在喉甚至悲愤莫名，奸人当道的反思当是推动社会历史健康发展的鞭策力量。

3 先发制人、杀人灭口

如前所述，杨士琦是一个非常机警敏锐的人，善于把握时机主动出击，决不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身为智囊，杨氏会先发制人地预谋，将可能置袁世凯于被动的一切不利因素连根拔除，包括杀人灭口。而且，他还曾“以兼金向西人购得无色无味入口即死之药水”^{[3]209}，向袁世凯献计“杀人用奇策”^{[3]209}。

尽管光绪皇帝的死因今天已基本真相大白，即自然病死。但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光绪系被毒杀的谣言曾闹得沸沸扬扬，其中一说即光绪死于袁世凯、杨士琦之手，“西太后疾大渐，袁世凯忧之，谓光绪复政，彼必有大祸，是当绸缪未雨。杏城乃以奇策于袁，故西太后垂危，而光绪同告宾天矣……世凯、士琦以药水授莲英，西太后病革，而光绪死矣。”^{[3]209-210}

如果此案只是一种传言，那么民初曾牵涉宋案的赵秉钧的死，杨士琦就难脱干系了，因为赵秉钧确是被袁氏毒死，杨氏预谋并下手的嫌疑最大。刘成禺就曾说：“后此种毒药水，乃入赵秉钧之口。黄季刚侃为赵秘书长，极相得。季刚告予曰：每晚必与智庵靠鸦片盘谈公事，谈倦，智庵饮人参水一杯方眠。一日喟然曰：项城帝制，是自杀也，我亦有杀身之祸。我愕然不知所云。过十余日，予与靠鸦片盘，倦归。不十分钟，急促予往，智庵已染急症，目瞪口呆，不能言语。问其家人，曰：饮人参水后，即发病，而打烟侍僮，已不知去向。事后，始知以十万金贿烟童，滴毒药水于人参水中，即死。咸知杨杏城所为，无敢言者。”^{[3]210-211}

以上两案传为杨士琦所谋虽没有十足的证据,并且前者基本已被否定,却也符合杨氏一贯诡计多端的作风,合乎推测的情理。所以,即使是厉害如黄远生所称“著著进步之权谋家”^{[1]21}的梁士诒(燕孙),也不得不防着这位“杨五爷”,“梁曰:‘我梁某性命,不怕袁项城,倒怕杨杏城,惧其下毒药辣手也。’当时有署联燕孙门者:‘红杏枝头春意闹,乌衣巷口夕阳斜’云。”^{[3]210}

4 巧饰掩蔽、推波助澜

民国成立后,杨士琦很长一段时间居住在上海,不担任什么官职,表面看来似乎远离了处于权力中心的袁世凯,实则不然,袁世凯的一举一动他都“心领神会”。“二次革命”前,杨士琦曾向杨度透露袁的打算:“1911年南方闹革命,项城倒而复起,这是他千载一时之机,他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但他既不肯为清朝打天下,又不愿夺天下于妇人孺子之手,于是采取了不左不右的手法,一面利用南方的革命势力去推翻大清,一面又利用清政府这个机构去对付革命军,等到大清被推翻了,项城必将排斥同盟会而独霸天下;这个时期眼前就要到来;将来同盟会被他打倒了,他必将废除以内阁制为基础的《临时约法》,而代之以总统制为基础的新约法,到了那时候,政治趋势不外乎维新与守旧的两途,维新要起用人才推行新政,守旧就要收罗旧官僚恢复一切旧规章、旧制度。”^[7]和袁氏如此这般“心有灵犀”的人,袁世凯岂能不用?从袁氏镇压国民党走向独裁最后帝制自为,杨士琦始终如影随形,但他不声张、不显扬,于巧饰掩蔽中完成了推波助澜的“使命”。

首先,在袁氏对付国民党的问题上,善于掩藏的杨士琦充当了“特务”的角色。袁世凯的特务活动主要是赵秉钧负责北方,杨士琦负责南方。“那时对付国民党都是杨为之设计,他与袁、赵暗通消息,作出安排。他曾利用民党与旗人作对,也挑拨民党各派系使相互攻讦,还唆使地方官僚、地方势力反对民党。据袁乃宽说,杨做的事比赵多。郑汝成是杨的一大帮手,死后还被袁世凯封了侯爵。”^[8]

其次,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闹剧中,杨士琦扮演了顺水推舟的角色,“袁任总统,杏城快快无所试,遂走袁克定之门。适克定自柏林归,遂引杏城为谋主。杏城意袁怀前隙,非出奇计,无以结袁之宠,遂以帝制之说进;克定昏聩,遂兴太子之迷,深相结纳,言听计从。外传洪宪核心,实在二杨,其实哲子(度)浮夸,但事宣传拉拢,运筹帷幄,固全在杏城也。”^{[3]212}但是,以杨士琦的精明,他不会自绝后路。因此,时虽身为政事堂左丞,筹划帝制“责无旁贷”,他却始终半遮

半掩,暗中运作。而且,杨士琦“大雪无痕”的手腕显然影响了一直以来与他惺惺相惜的袁世凯,袁氏也一度采取了同样的姿态,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全国大兴劝进合唱的当头,1915年6月22日爱将冯国璋谒见他,并询问他是否有意帝制以着手布置时,袁竟还扭捏作态、欲盖弥彰地表明“无意”的态度。

杨士琦本是帝制主犯之一,这是历史的真实毋庸置疑,“杨士琦之为人,阴柔奸险,他虽未担任大典筹备处之职务,而实在是洪宪逆案之罪魁祸首……确是中国的罪人。”^{[4]237}但是,“巧饰掩蔽、推波助澜”的伎俩却使杨士琦平安脱险,“杏城巧于掩蔽,不居显位,罕发文电,故洪宪罪魁,竟无其名。”^{[3]212}黄远生曾认为“杨(注:即杨士琦)之与梁士诒氏虽相水火,而以一思想的手腕家与著著进步之权谋家相抗衡,XX乎其非匹敌也明也。”^{[1]21}如果他能活到洪宪帝制破产、黎段掌权之日,看到梁士诒被作为帝制罪魁遭到通缉而杨士琦却逍遥法外,他一定会颠覆前论。

然而,历史自有公断。杨士琦虽不失为一个有一定智慧和才华的人,其“议论颇多警辟之谈”^{[1]21},其文采斐然,“载振辞职之奏稿,即出于杨士琦手笔,措辞得体,传诵一时。”^{[4]141}这也是黄远生认为他是“思想的手腕家”的原因。但杨氏的这点小才智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遮盖他阴险狡诈、势利歹毒、助纣为虐的不端品性,是时连安徽老乡、大学士孙家鼐都向慈禧坦白:“士琦小有才,性实巧诈,与臣同乡,臣知之最稔,盖古所谓‘饥则依人,饱则远扬’者也。”^[9]不言而喻,杨氏乃算尽机关的奸宄之徒,其丑角般的政治表演只能为他留下千古骂名。

参考文献:

- [1]黄远生. 电影中之交通总长[A]. 黄远生遗著(卷四)[M].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二十一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
- [2]廖一中. 一代枭雄袁世凯[M].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 [3]刘成禺. 杨杏城之毒药水[A]. 世载堂杂忆[M].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台北文海出版社.
- [4]刘厚生. 张謇传记[M]. 上海书店影印版,1985.
- [5]岑春煊. 乐斋随笔[A]. 近代稗海(第1辑)[C].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02.
- [6]胡思敬. 国闻备乘[A]. 近代稗海(第1辑)[C].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73.
- [7]陶菊隐. 六君子传[M]. 中华书局,1947:81-82.
- [8]唐在礼. 辛亥以后的袁世凯[A]. 八十三天皇帝梦[C].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44.
- [9]张学继. 袁世凯幕府[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47-148.